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

Changes in the Garrisoning Eight-Banners Ethnic-Group Society in Qing Dynasty

潘洪钢◎著

人民出版社

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

Changes in the Garrisoning Eight-Banners Ethnic-Group Society in Qing Dynasty

潘洪钢◎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 / 潘洪钢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01－011537－5

I. ①清… II. ①潘… III. ①八旗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5423 号

QINGDAI BAQI ZHUFANG ZUQUN DE SHEHUI BIANQIAN

潘洪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1092 毫米 1/16　印张：41.25
字数：700 千字

ISBN 978－7－01－011537－5　定价：1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历史的记忆（代序）

满城城在府西头，特为旗人发帑修。
仿佛营规何日起，康熙五十七年秋。
——清　吴好山《竹枝词》

这首成都竹枝词描述的是成都满城修建的情况。在成都人的历史记忆中，自清前期的康熙时候起，当地人就与驻守其地的满蒙旗人同居一城。不同的是，驻防此地的八旗官兵，在府城西头独辟一地，就地成城，与当地人虽在一城，却又相对隔离。无独有偶，江南繁盛之地的镇江府，也流传着一首民谣："五条街，挤不开；大市口，没人走。"五条街所指，是镇江城内汉民居住区的街市，而与之相邻的八旗兵丁驻地大市口，虽然也是旧时繁华通衢，却鲜有人群通过，因为那是八旗兵驻守的旗营之地。民歌民谣中体现的，就是普通人民对清代八旗驻防的历史记忆。

在当代社会大众的历史记忆中，八旗驻防族群已经消失于历史的地平线以下了。文本记载中，他们自清中叶起即已逐渐衰败，成为一支不能打仗的军队，一个无所依托，无所事事的群体，乃至有人蔑视其为寄生的族群。八旗驻防故地，剩下来的只有一些路牌、街巷名称、车站名，往日的辉煌早已被雨打风吹，一扫而去了。而八旗驻防族群及其后裔记忆中的历史却迥然不同，他们是国家的军队，是王朝的基石，他们为国家与历史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在旧日营房街巷的牌匾下，跃动的仍然是族群的历史记忆。对八旗驻防族群的研究，正是这种历史记忆的梳理和社会变迁过程的重现。

一、研究缘起

我关注和研究清代八旗驻防问题，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那时，我在中南民族大学（当时称为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史研究，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南方少数民族史，虽然清代民族史是我关注的内容，但北方民族和满族的历史与文化，并不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在民族史的若干课题研究中，我对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问题一直较为注意，认为这个问题是中国民族史的重要领域，值得下气力去深入研究，但这也仅仅停留在思考阶段，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切入点。80年代中期，我赴湘西参加一个关于清代乾嘉苗民起义的学术会议。会议中，一位北京香山“苗寨”代表的发言，引起我的思考。关于北京香山“苗寨”居民的族属，学界尚有不同认识。但无论如何，他们久居京畿之地，处于满、汉民族的包围之中，却长期保持了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在与周边民族差异的基础上，保持着他们自身强烈的民族情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呢？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要选取几个类似的典型，研究长期生活于异族包围之中的少数民族群体，了解他们的历史变迁，研究他们与当地多数民族的关系。这样，处于汉族包围中的清代八旗驻防族群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

最初关注这个课题，是把八旗驻防这一族群，作为一个民族融合的典型事例来看待的。试图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搞一个特例的研究，把几个民族融合中的特殊事例写成一个系列论文，例如，湘西南的“大小章人”、北京香山的“苗寨”、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族等。当时的想法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系列研究，探讨民族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后来，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离开了学术研究岗位，这个研究中断了。其间只写了两篇关于驻防八旗的文章，一是《辛亥革命与驻防八旗》[①]，提交并参加了199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二是《辛亥革命与荆州驻防八旗》[②]，提交并参加了湖北省史学会1991年年会。由于当时是为参加辛亥革命的学术会议所写，所以也主要是从

① 该文全文发表于《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版；节选发表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② 潘洪钢：《辛亥革命与荆州驻防八旗》，《满族研究》1992年第2期。

辛亥革命史的角度切入的，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如何对待民族问题及满族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也有涉及。由于当时学术界对八旗驻防问题研究的成果极少，而我从这一角度切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算是有些新意，所以两篇文章至今还常常为研究者引用。

2004年，我重新回到学术岗位，而根据工作的需要，研究的角度也有所变化，但当年对驻防旗人这一族群的研究，仍然萦绕在怀。而此时，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已出现了一大批可观的成果。以我个人离开学术岗位十余年的情况来看，想追踪学术前沿，殊为不易。我所在的省属社会科学院这类单位，多半资料缺乏，一般也难以取得科研经费支持，这更增加了课题研究的难度。幸运的是，2005年，我申报的“清代驻防八旗的历史变迁研究”得到了湖北省社科基金的资助。这样，我对八旗驻防问题的研究得以重新启动。随后，我重新开始了对驻防八旗问题的研究，陆续完成了若干学术文章。由于工作需要，其间我也做了一些清代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而对驻防旗人族群的关注与研究并未放弃。2013年，我以八旗驻防族群变迁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获准得到资助，这一课题的研究终于可以重新走上正轨。

清代的八旗驻防制度，沿自入关以前。入关后，随着战事和镇守的需要，逐渐推广至全国。由此形成有清以来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族群，其兵额及人口数量略少于京旗，但他们携眷而来，聚族而居，兵民合一，战守结合，驻守全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战略要地及关隘，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从族群角度来看，他们几同于汉族汪洋中的一座座孤岛。这个特殊群体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无疑是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对这一族群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的研究，也具有多学科的学术价值。根据个人和单位条件，我决定从田野调查开始进行此项课题的研究工作。数年来，我们走访了荆州、成都、广州、开封、青州、杭州、南京、镇江、福州、长乐、西安多处清代八旗驻防故地，有些地方反复多次进行田野调查。在一些地方，八旗驻防的遗迹已然烟消云散了，即使是当地政府主管民族事务的民委、民族宗教事务局或科研单位，也无法提供相关信息了。在有些地方则幸运得多，或于相关机构中获得各种有效信息或资料，或者找到当地驻防旗人后裔，或者找到了驻防旗人后裔聚居之地，信息量巨大，获益良多。尽管计划中还有许多地区要去，但限于经费

和时间，目前此项田野工作只能初步告一段落了。呈现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便是结合田野和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初步成果。

二、历史记忆和民族心理

从方法论上讲，笔者是将田野调查、访谈作为本项研究的起点，将其作为历史文献的重要补充看待的。而事实上，田野工作也给本课题的研究，带来许多建设性的启示。以笔者的体验来看，很多时候，田野工作所带来的现场感和新思路、写作灵感等，甚至远远超过了访谈内容本身的意义。

毫无疑问，口述记录是田野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它记录了访谈对象的历史记忆。但这种口述记录的缺陷也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在“任何情况下，记忆都具有选择性；它不是一种记录或追溯的过程，而是在某种语义系统内纪念或熟记某种现象的方式，这种语义系统本身又在不断地发生变化”。[①] 也可以认为，口述史是调研人与被调查对象共同建构的新资料。调查者的提问方式，访谈现场的氛围等都会造成口述记录的变化。如笔者在从事南方民族田野工作时所体验到的那样，一位调查人提问时加了一句“三中全会后你们这里的生活好多了吧?”结果被调查人立刻顺着提问的方向做了大量肯定性的回应。事后我悄悄问对方，你知道三中全会是何时开的?对方笑笑说，真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时间。这当然是一种特别典型的事例，一般有经验的访谈者不至于出此大错，但它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访谈者对调研对象的引导性提问，会产生一些修正和改变事实的记录。正因为如此，我们非常赞同一种说法，“口述资料有着无法回避的事后认识成分”。“外人的存在会影响受访者回忆谈论过去的氛围。也就是说，口述史的产物是由被访问人跟做访谈的史学家共同完成的。……历史学家必须承认他们在创造新证据中的作用。”[②]

---

① ［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寻》，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8 页。

② 胡鸿保：《学做满族史研究：一些个人体验》，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14-07-16/18399.html【社会学视野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

因此，对于访谈记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学者们普遍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刘小萌在评价《青州旗城》一书的剪裁标准时说："对于民间口头传说，特别是有关重大事件的传说，只要找不到文字依据，就尽量不用。"[①]这里涉及的是对调查资料处理的两种不同方式：一是刘氏所说的，用传统史学方式，以文献资料对口述材料进行印证。这种方法也得到了历史学界学者们的认同。二是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学家们常用的做法，以学术的眼光去追寻讲述者内心深处的真实，他们为什么记忆了这一些而没有记忆文献中所说的另一些，探寻选择性记忆的缘由，从中寻找出民族文化遗传中的"真实"。

在我看来，田野工作给学者带来的现场体验和心灵冲击，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例如，2014 年笔者赴福建长乐县琴江满族村考察，这里是清代八旗水师旗营故地，修复和保存了相对完好的一条旗营老街，水师旗营官兵抗击法国侵略者死难烈士陵园等，都给人带来很大的冲击与震撼。除了修复的高大的"孝悌坊"以外，经当地旗人介绍，笔者看到了旗营旧时旌表贞洁烈女的残碑。据介绍，清代小小的琴江八旗水师营，曾有过一百多块这样的烈女碑。难以想象，人口最多时也只三千多人的琴江旗营，竟然出现过如此之多的烈女。这是一种怎样的情形，不到现场，不亲身体验，是无法理解的。

很多时候，田野工作也会带来文献中未曾见到的新发现、新想法。如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一直以辛亥革命发生的 1911 年作为驻防旗营根本性转变的时间标志，总体上当然不错，但历史的复杂性并非如文献所反映的那般简单和统一。如开封驻防旗营后裔的历史记忆中，辛亥革命与旗营彻底解散的时间点是 1922 年到 1924 年间，与我们以往在文献中得到的时间相差十多年。开封旗人的粮饷一直发放到 1922 年冯玉祥军队遣散旗人时，老人记忆中的挑马甲实际上也延续到这一年。因此人们开口说旗营的解散，一般均称是冯玉祥所为。[②]

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驻防旗人族群，二百余年的驻防生活，早已土著化，他们生活彻底改变的时间，也会因地域和形势的不同而出现极大的差

① 刘小萌：《青州旗城——一部驻防旗人的实录》，《满族研究》2000 年第 4 期。

② 冯玉祥在开封对旗人的做法与在京城驱逐溥仪小朝廷如出一辙。但他在开封还没收寺庙为公产，用于办学校，宣布妇女放足，也办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

异。这也是本书一个重要观点的来源，即：辛亥革命后，各地驻防旗人走上艰难而又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观点不仅得到文献的验证，也一再为各地驻防旗人的调查结果所证实。如同本书所叙述的那样，辛亥革命后，一些驻防旗人后裔经过艰难转折，逐渐成为城市贫民；一些地区驻防后裔则成为自食其力的农民；也有个别地方的旗人，仍然以从军、当兵为主要职业，其驻防故地，则主要成为军人家属聚居之地。即使是同为汉军旗人后裔，在不同地区，也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如广州驻防汉军旗人后裔，基本都报了汉族成分，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热衷于参加广州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广州满族联谊会的活动并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但在民族归属上，他们已然成为汉族成员了。而在福建长乐市的琴江村，虽然也是汉军旗人后裔，他们却坚信自己的满族身份，并且无论在户籍族属还是族群心理上，他们都已成为满族的一员。即是专家所称的“汉军旗人满化的典型例证”①。

几年之中，行走下来，每到一处调研，都会有新的发现和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讲，田野工作不仅是与文献互相印证的资料，而且也是历史文献的重要补充。

八旗驻防旗人后裔，保持着极强的民族自我认同，令人印象深刻。2014年秋，笔者赴开封驻防旗人后裔聚居的“里城大院”考察，对当地满蒙民族人民的民族认同与自豪感印象极深。在我们走访过的旗城故地，到处能得到类似的体验。例如在成都，在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的支持和安排之下，我们在几天时间内，密集走访了十三位80岁以上的老人。这些满蒙旗人后裔，低调朴实，待人谦和。96岁高龄的蒙古族同胞刘瀛老人，见面时仍作出了一个开弓射箭的姿势，向我们展示他臂上的肌肉。这位爽朗健谈的老人，回忆起旧时旗营口耳相传的故事，流露出强烈的民族认同与自豪。在青州、广州、福州等地，作为一个时常提示自己要保持学者立场的访谈者，我们却时时被满蒙人民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所打动。从外表与日常生活的角度观察，清代驻防旗人后裔早已深深融入当地社会，但他们对于往日生活的历史记忆却时时萦绕在

① 定宜庄、胡鸿保：《从族谱编纂看满族的民族认同》，刘凤云等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怀。诚如《花城旗语》一书序言中所说的：

> 广州满族对根的追寻却未敢须臾遗忘。当朋友问起："老家是哪里的？"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众口一词："我是满族人，老家在东北。"然而，他们又是地地道道、如假包换、有据可查的"老广州人"，有二百五十多年八九代人的历史可证，比许许多多本地汉民都更有资格。他们纯正得不能再纯正的粤语口音，娴熟得不能再娴熟的粤语方言、俗语、俚语的运用，没有人敢怀疑他们不是"老广州"。其实，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广府文化及其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熟知，与生俱来，同岭南粤海早就融为一体了。①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旗人族群关于历史的记忆，也是有选择性的。我们随时都能发现，他们选择性地记住了辛亥革命后在民族歧视下艰难求生的处境，忘却了他们也曾高高在上地拥有过与当地民族不同的生活。"对于一些大城市，尤其是满汉关系较为紧张的八旗驻防地旗人而言，辛亥革命是一个受难的历史。与革命军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以及举家自尽的惨景人们至今记忆犹新。而描写清代旗人'仗势欺人'行为的学者的叙述，则受到部分满族的强烈谴责。人们无意识中在忘却曾经拥有过特权的历史，而受难的历史却深深地刻印在他们脑海中。"②这种情形生动体现出记忆的选择性。当然，选择性记忆不

历史的记忆：福州满族赵燕生先生向笔者讲述旗营历史

① 李兰芳：《花城旗语·序》，金玉阶、伍嘉祥、沈林主编：《花城旗语》，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② 刘正爱：《孰言吾非满族——一项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仅是旗人后裔，当地汉民族也是如此。例如，福州旗人记忆最深刻的往往是他们在辛亥革命后所遭遇的民族歧视，而在当地汉人记忆中则显示辛亥革命以前他们途经旗营地段曾遭受的欺凌。

这就是所谓选择性记忆，旗人记住了民国时期受欺负的事，而汉人记住了此前他们被踢的事。而史实如何，在这里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各自选择性的记忆。从这个角度体会，则田野工作、口述记录等，在研究中需要进行综合评估，除了与历史文献记载进行比勘外，须做人类学家们一样的工作，探究讲述者选择性记忆的背后原因。

历史记忆的选择性也明显地体现在文本文献中。在汉族的许多记忆和叙事中，旗人是腐败的压迫者，满族早已消融于汉族文化与社会之中了。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性记忆，不仅是社会大众，网络网站，甚至在学者群体和学术文章中，这类事例也屡见不鲜。一个典型而流传广泛的讹传是，“满人居于统治民族的地位，生下来就吃钱粮，不是做官、当差，就是当兵，就是闲散人丁，也是不事生产，游手好闲，斗鸡走狗，出入茶馆酒肆，生活日趋腐化”。[①]“关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我在军中常听老官、老兵这样说：旗人（满族）不论男女，小孩一生下来，就到内务府报名注册，开始吃皇粮，每人每月支给银子2两、大米1包（200斤）。旗人自己常常夸耀说他们有铁杆老米树，旗人男子长到18岁，就考试拉弓射箭，稍好一些的就取拔为‘千总’之职，每月支给薪俸；女子长到15岁，姿色好一点的就选为宫中女官。在内廷供奉的御戏子们，每天夜里都到贝子、贝勒、千爷府中去教他们男女老少学唱京戏。这些贵族的男女老幼几乎没有不会唱京戏的。总之，旗人大都过着不劳动、不生产、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的生活。”[②]在学者们极具学术水准的论文中，这类说法也随处可见：“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以其勇猛剽悍建立了大清王朝，从而转变为一度拥有各种特权的统治民族。”[③]这当然是典型的选择性的历史记忆与讹

①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史志资料》1985年第1辑（总第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② 王冠军：《清末军中见闻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册，第303—304页。

③ 张福记：《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传，笔者已无数次见到关于旗人男丁一生下来就有一份粮饷的说法了，甚至在旗人后裔中也偶然会听到此种说法。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和社会舆论的宣传，滋生出这种错误的说法，广为流传。此后的各种书籍与宣传，进一步扩散与流布。旗人后裔的主要记忆是当年的困苦生活，但多年后也会有人受到此种说法的影响。事实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旗人当然不可能是一生下来就有一份粮饷的，否则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无饷可领的旗下“闲散”。下层旗人无疑是被剥削和被压迫者，是军人及家属构成的族群，由于其特殊的民族组成，常常遭到诟病。旗人到底是不是寄生集团，是不是统治民族，这种笼统的说法，大可质疑。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满族精英、学者的历史记忆。金启孮先生在《北京郊区的满族》中集中说明这样的观念：

> 清代八旗兵（其实包括满、蒙、汉、索伦，达斡尔等族都在内）有饷还有米（米因存新米发陈米，所发多半是“老米”），解放前有人骂他们是：“铁杆庄稼，老米树！”意思是说他们“不劳而获”，“坐着等吃”，永远不愁钱和粮，是和皇帝一样的剥削别人。……因为他们付出的重大牺牲，才创造了国内的和平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农、工、商、士，才能自由自在地种地、做工、做买卖，考举人进士。难道反过来却认为他们领军饷和吃“老米”都不行，都是剥削了别人，这种讽刺完全是一种民族偏见的产物。①

这里关于“孩子一落地便是养育兵”的说法当然不准确②，但它却体现出旗人后裔与前述说法完全不同的旧日生活记忆。在他们看来，旗人当兵吃粮，是职业分工，旗人群体是为国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职业军人集团，是“负担最重的”群体，绝不是统治者。试想，哪个朝代的兵不是由国家以各种形式供养？他们不仅应该由国家供养，而且应该供养得更好一些才合理。全体旗籍人口以当兵为出路，当然会造成民族统治的印象，但那是清代军政制度的问题，而不

① 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满族研究》1985年第1期，创刊号。

② 养育兵制度是雍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而且也要依据各地旗营的闲散人数、年龄和有无资金来源等情况确定人数，并非传说中人人有钱粮的情况。

应由全体旗人，尤其不应由下层旗人来承担。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切对此的讽刺，均应归于“民族偏见”。

金氏这一论述与前述关于统治民族的论述放在一起看，就能明显看到历史记忆中体现的民族心理问题了。满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打下和保卫今天的天下，老子是国家的兵，还不知道明天死在何处，当然要今朝有酒今朝醉了。金氏之论也当然也有道理，他们的确是国家的职业兵。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将一个人口不断增长的民族，整个作为军队养起来，尤其是在长期的和平时期，肯定是行不通的，无论你对过去的历史有多大功劳，实际上也是养不下去的。从长远看，一个民族完全与社会生产脱节，对该民族本身也是一种枷锁，士农工商全然不懂，而且是一个人口数量很大的民族，结果这个民族最终会被历史淘汰。另外，我们注意到：满族由于辛亥革命后所遭受的歧视与痛苦，从民族心理上更加认可“铁杆庄稼”，而更难与周围民族产生族群认同感。虽然他们表面上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隐瞒其民族成分，在心理层面则从反向加强了他们对自身民族成分的认同。

对于满族是否同化于汉人之中，也同样有此类说法。较早的说法见于清末民初时期：“清自满洲崛起，君临天下，悉主悉臣，鉴于前代之事，满人不求文学，惟重骑射。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诸险要，画地而居，不与居民杂处，不与汉人联姻，备之未尝不周。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①] 直至近年的公开出版物中，满族已然被同化的观点仍然常见：“清朝灭亡之后，满族似乎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原本以狩猎为主的生产形态再也回不去了，改成了完全的农耕生活；他们原本的信仰萨满教，如今也只留下某家有病有灾时偶尔请人跳跳大神了；语言和文字也濒临完蛋，如今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全国也就 100 多人了，还清一色全是老人，再几年会不足百人，精通满文的只有 50 余人；生活习俗也汉化得无微不至，服饰、音乐也只留下了一点残渣……一切的一切都改变了。事实上，满族已经名存实亡，历史上的那个极具原始血性的民族已走进了历史的深处。”[②] 满族已经消亡的说

① （清）刘体智：《异辞录》卷 4，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232 页。

② 档知部：《蒙满大结局的差异》，《陕西档案》2010 年第 4 期。

法，近年仍然时见于报章，已深入很多人的观念之中，成为一种深深的历史记忆。今天一千余万满族人口中，不能排除部分因某种政策导致其他民族人口的融入，如在满族聚居地区高考加分照顾政策就会使一些人寻找某种家族或历史的缘由加入这一民族，但应该看到的是，其中也有大量的旧时旗人后裔，因其强烈的民族情感与文化传承而恢复满族成分，回归满族。

琴江满族村许辉先生保存的旗兵功牌

但无论如何，历史记忆也会体现民族心理层面的问题。广州地区流行的旗人用烫死鹌鹑讹诈茶楼老板的故事。在清末以来汉族文人的记忆中，广州驻防旗人利用旧时茶楼伙计逐盅给客添水的习惯，将鹌鹑置于茶盅内，以致被伙计加水时烫死，“旗人即以此为‘百胜将军’，价值不菲，索赔巨款。茶居经此事件后，就改变做法，凡客人不掀开盅盖置于一旁的，伙计即不加水，以免纠纷。现今我们揭开茶壶盖示意冲水的做法，就是由当时沿袭下来的。”[①]然而在旗人精英的叙述中，事情就是另一种叙述方式：

> 有些人又虚构说：满人常在茶楼斗鹌鹑作赌博，严重影响营业。茶楼“企堂”（即服务员）曾规劝之，满人怀恨在心，便将鹌鹑放于茶盅内（过去广州茶楼是用茶盅的，每位一盅。茶室、酒家则使用茶壶），待“企堂”揭开茶盅盖冲开水时，将鹌鹑烫死（另一说是鹌鹑飞走了），于是，满人殴打“企堂”，还向茶楼老板勒索高昂的赔偿；自此以后茶楼则规定，茶客加冲开水时，必须自行将茶盅盖揭开，以免再生事端。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污蔑，虽是很易于解析及弄清是非的，但在民族压迫时期，少数民族受到的诽谤却无从置辩。因而使这些谣传不胫而走，影响甚坏，流传甚广，

① 黄国声：《羊城谈旧录》，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话旧羊城古今精选 1987—2000 上》，广州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69—470 页。另，张建列《走进八旗博物馆广州旗人文化知多少》一文沿袭了民国以来的这一说法，见《广东科技报》2014 年 1 月 24 日。

在各族间确实起到挑拨离间的作用。……关于在茶盅内烫死鹌鹑一事，经过调查，认为自有茶楼以来，茶客需要添开水时，均要自己揭开茶盅盖，放在茶盅旁，不需呼唤，也不要敲茶盅，如敲茶盅会引起茶楼老板误会认为“企堂”偷懒，他有被开除之虞，故必须自行揭开茶盅盖，“企堂”才会前来加冲开水，历来如此。所以是不存在冲开水时烫死（或飞跑）鹌鹑的事情。①

广州茶盅揭盖习俗中这个关于满人欺压汉人的故事，两种说法完全相反，是选择性记忆的典型事件。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这是一个旗人敲诈茶楼的故事，而旗人则说经过调查，广州自有茶楼以来就是开盖添水，这个故事是民族歧视观念下的捏造。驻防旗人后裔对此类事务的辩诬，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民国以来民族歧视状况的反弹。

另一则典型事例是广州驻防旗人后裔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问题的置辩。2011年7月2日，广州《羊城晚报》发表了邱捷教授的《广州城独特的“和平光复”》一文，回顾并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广州和平解决旗营问题的过程。广州驻防旗人后裔舒肇甦随后致函报社，除了对旗营和平解决问题进行讨论外，对用“光复”一词界定辛亥革命的性质提出异议，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一个民族从另一个民族手中夺权，采用辛亥革命是光复，容易使人意会将满族推至中华民族之外”。笔者在2004年赴广州调研时，广州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汪宗猷先生曾表达了对“八旗子弟”一词的不满：“八旗子弟这个称呼是不准确的，在很多时候，这个词是有贬义的，专指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我们广州满族，都是驻防的八旗子弟，但却是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人民。”②与之类似的却更具影响的是，20世纪50年代，在满族代表的要求下，国务院于1956年2月18日发出通知，要求“在各种文件、著作和报纸、刊物中，除了引用历史文献不便改动外，一律不要用满清这个名称”。因为，这一称呼“如果继续使用，可能使满族人民在情绪上引起不愉快的感觉”。所谓情绪上的不

① 汪宗猷：《广州满族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曹萌主编的《中国满族文化资源与发展分省描述与研究》照录的汪宗猷先生的说法。

② 2004年作者与汪宗猷先生谈话记录。

愉快，就是不同历史记忆所表达的民族心理。

历史记忆与民族心理问题早已引起学者的深入讨论。“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①。而这种历史记忆的差异，也给历史学者探究历史真相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路径。“受当下关切、文化传统、社会体制、政治权力和语言驯化等因素的制约，记忆不免具有重构和诠释的特性，但也不应因此而全然否认其通向真实过往的可能性。”②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问题，涉及旧时旗营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是“宏大叙事框架下的琐碎历史研究”，但笔者坚信，整合历史的碎片，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具有学术求真的史学理论意义，亦且有益于对现实国情的认识。

三、学术前史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八旗制度及八旗驻防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充积。仅相关研究“索引”即达数十页之多，实难一一缕述，仅就笔者见闻所及，略述其一二，正文中如有涉及，亦于页下注中进行说明。即此，仍难免有挂一漏万之憾，兹述其大略。

就国内外研究状态而言，很少有哪一个有关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课题如本课题这样，受到欧洲、俄国、日本及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果灿然可观，而国内学术界自辛亥革命后有所谓规范化的学术研究以来，在这一课题方面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甚至在辛亥革命后的数十年中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禁区。只是到文革后才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所以有学者评论说：“至于从清末到民国这一时期满族的兴衰，也许由于多年来一直是敏感话题甚至已部分地成为禁区，至少在国内，更几乎是一片空白。”③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国内在这一课题上的研究一直就是一片空白；相反，由于八旗和八旗驻防本来就是中国历史，而且是时间较近的重大历史问题，所

①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绪论”，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② 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③ 定宜庄：《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满族研究》2002年第1期。

以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其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清代，它实际上涉及国家军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军事机密，很多文献中对于它的资料讳莫如深。如清代户口管理制度对于作为统治基石的旗人，有严格的统计与管理制度，却无完整的人口统计数字可寻。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在清代八旗兵丁总数保密，并不公布。康熙年间修《大清会典》，在凡例中说“八旗士兵云屯，难以数计”。因此未记载北京八旗兵额，只记有驻防八旗兵数，后来历朝撰修《大清会典》都沿用此例。这是为了保密，而现在收藏的档案资料既不完整，又难以统计。所以清史、满学及社会史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时只能以佐领来推断大体的人口数。二是辛亥革命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由于民族问题的某种敏感性，影响了这个研究的进展。

认真追溯起来，对于八旗制度的讨论，起自于旗制在内地确立之后，大体上自康熙时就已开始了，但那时对旗制的议论，主要还是为了完善这一制度而不是研究。另外，驻防制度作为旗制的重要部分，一般研究旗制都会涉及。康熙以后直到晚清时期，在旗人生计问题困扰清廷的情况，对八旗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一直就存在，并在乾隆时期达到一个高潮。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从晚清时期才开始的。如晚清时期魏源说八旗制度是“于封建有其名无其实，于藩镇收其利而去其害，损益百王二千年之法，至是而大定，然亦自铲除四藩深维干支之谊而后定”。[①] 驻防方面：“若夫驻防之兵，则无论骑、步，皆合满洲、蒙古、汉军以为营。”“畿辅驻防二十有五，兵八千七百五十有八。东三省各城驻防四十有四，兵三万五千三百六十。新疆驻防八，兵万五千一百四十。各省驻防二十，兵四万五千五百四十。”“加上各地守围场、守陵寝、守边门等，共驻防兵十万七千七百有六十，皆统于将军、都统、城守尉。”[②] 以此估计，天下旗兵，总额二十一万余人，其中驻防各地约十万，京师则十余万人，（东三省和新疆还有一部分后来归队的少数民族编定的佐领，如达斡尔、锡伯、索伦兵等）这就是世人所称的“居重驭轻”之法。魏源以外，清人对八旗与八旗驻防

① （清）魏源：《圣武记》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1页。

② （清）魏源：《圣武记》卷11，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9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